

期刊·观察

从“暑期档”看年轻人的新活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2025年暑期档的成绩单陆续出炉,从中体现出不少新热点、新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银幕上,今年暑期档仙侠剧集体“哑火”。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25年暑期档全网正片总播放量284亿,比去年的320亿下降11.3%。在“仙侠”这个品类中,《临江仙》播放量最好,但依旧不足以出圈。仙侠剧市场已然出现疲态。文章写道,仙侠剧是根植于中国神话、古典哲学、武侠精神而生的独特类型,核心剧情始终围绕着主角的成长、挑战与行侠仗义,承载着“御剑乘风”“问道长生”“济世苍生”的浪漫想象和独具风情的东方美学。业

界曾认为,仙侠剧对于国产影视剧集的意义,就等同于科幻对美国影视的意义。然而,随着仙侠剧的内核“侠”字逐渐被千回百转的情感线所替代,直至“有仙无侠,有情无义”,仙侠失去了数量最为庞大的年轻观众,恐将不可避免地步入黄昏。

电影“暑期档”,院线呈现出“上半场混乱、下半场逆袭”的走势。陈可辛的《酱园弄·悬案》,姜文的《你行!你上!》相继失利,证明过往“大导演+大明星+大场面”的模式已然失灵,反而是成本仅6000万元的《浪浪山小妖怪》直击打工人的心田。《新周刊》盘点说,“动画电影”

和“打工人电影”成为当下的电影新风口;《聊斋:兰若寺》《罗小黑战记2》《浪浪山小妖怪》等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动画电影,使得动画电影成为2025年最受关注的品类。与此同时,如果要评选2025年电影市场的关键词,“打工人”必然入选;《长安荔枝》里的李善德是古代背锅打工人;《浪浪山小妖怪》里的四小妖怪是被困在取经系统里的打工人;《戏台》讲的是民国时期的戏班打工人。

和仙侠剧面临年轻观众流失的处境一样,《新周刊》也注意到,看电影曾经是年轻

人线下休闲娱乐活动的首选,近年来他们给予电影的“配额”也相应变少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娱乐休闲的方式越发多元,短视频、游戏、短剧占据了年轻人的碎片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越发多元。

《新周刊》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转身向山里走去,到山谷和森林里探索属于新山民的生活。文章写道,古代的山谷,是个体逃离“礼崩乐坏”的一方净土;今天的山谷,则是一种主动建构的生活方式。新一代“山谷生活”不再是断绝尘世的孤岛,而是开放的、连接的。在这里,“诗意栖居”不仅是生活状态,更是一种

系统性的设计;建筑设计、社区制度、文化活动,都有意识地朝着“理想生活”靠拢。

《三联生活周刊》注意到,今年暑期最流行的旅行方式,是去村里“看房”。今年夏天以来,贵州旅游爆火。人们纷纷走进侗寨,在被时光盘包裹的木头房子之间,追寻一种如歌生活。花桥上,几个侗家老奶奶一边刺绣,一边闲话家常。桥下河水流淌,妇女弯着腰在洗蓝色布衣。寨子的小广场上,两三个孩童在追逐打闹,后面还跟着小狗。文章写道,现在是贵州侗寨,较早前是福建土楼、湘西吊脚楼、江门碉楼……这些传统民居接连成为人们奔赴一处目的地

的理由。中国民居不仅在线下热闹,在线上也热闹,B站高分纪录片《中国民居》第三季回归,开篇拍的就是贵州侗寨。从百名村民上山采原木,到掌墨师用鲁班符号给柱梁编号,再到工人用滑轮杆来组装木屋……随着镜头的推移,摄制组走进贵州多个侗寨,不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侗寨的建筑特色,还讲述了当地人如何举寨全力建造鼓楼的动人故事。

个体生命和宏大议题构成了当下大多数城市青年的生命坐标,个体需要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形成群体交往,建立亲密社会关系。于是他们走出去,去到人群和自然间。只要看到人,看到山水,看到天地,就能重新构建出人和人之间的联结,这便是年轻人的新活法。

■地理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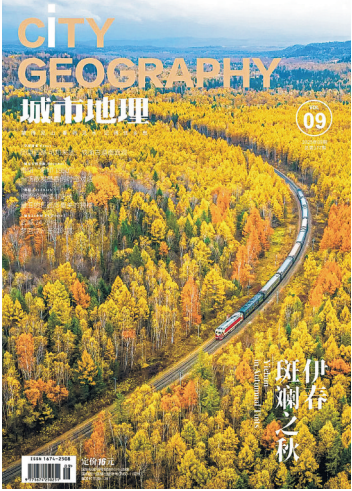
讲述贵阳“新印1950”的故事

《城市地理》2025年9月号,月刊

贵阳“新印1950”在贵阳老城区宝山北路与新印厂路的交会处。原址为始建于1950年的贵州新华印刷厂,这里曾是贵州省书刊印刷的核心基地,机器轰鸣、油墨飘香场景不仅是一代贵阳人的记忆,还承载了贵阳半个多世纪的工业记忆与文化印记。最新一期《城市地理》杂志讲述了这里的故事。

贵州新华印刷厂的前身是民营企业“时轮印刷厂”,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由民族企业家胡问遂创办。胡问遂是中国书法大家,生于浙江绍兴书香门第,自幼便研习书法。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也曾奔赴缅甸,参与修筑滇缅公路,后因病退回大后方贵阳休养,其间创办了时轮印刷厂,走上实业救国道路。当时的时轮印刷厂印制技艺精湛,在西南地区声名远扬。印刷厂主要承接教材、文史书籍一类的印刷业务,其中涉及抗日宣传的材料,皆免费印刷或者按成本价收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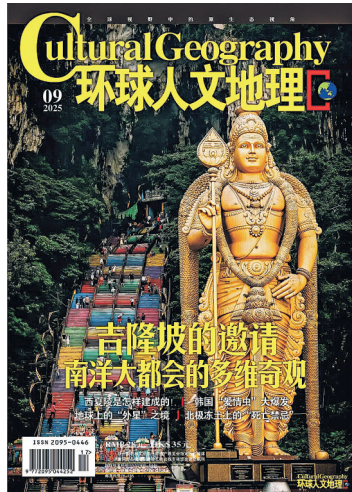
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建设浪潮中,时轮印刷厂几经更名,最终定名为贵州新华印刷厂,“新印”二字自此正式嵌入城市记忆。新印厂位于贵阳市中心城区,周边交通便利、人口密集,文化氛围浓厚。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传统印刷业逐渐式微。2020年4月,由于生



产线被迁至高新区沙文科技产业园,新印厂成了老城区里一道沉默的工业年轮,过往的“新印”成了而今的“旧印”。而“旧印”还能重焕生机为“新印”吗?

文章写道,当“创新文旅新模式”成为城市发展关键词,印刷厂的未来在“城市更新”项目推进的鼓点中清晰起来。新印厂的改造项目采用“多维度打造”“微改造”“微更新”的改造策略,最大限度保留建筑原有结构和风貌,填补公共空间缺口、联动周边开发,让厚重历史与鲜活潮流自然交融,为沉睡多年的厂房注入新的活力。2024年5月,改造后的街区命名为“新印1950 Discovery”,正式对外开放。

如今,老印刷厂斑驳的墙体被赋予新的生命,锈蚀的齿轮化作艺术装置。这场改造如同打开了贵州工业史的密码箱,让抗战年代的印刷精神与当代生活美学,完成了一场关于城市记忆的时空对话。



梁,但在当时已算大型城市。据估计,城内居民约有20万人。

在营造新都城的同时,帝王陵墓的营建也同期进行着。对李明德而言,这不只是将父亲迁葬到更安全之地,也暗含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雄心。他不仅要通过富国强兵壮大势力,建造一座媲美唐宋气象的都城,还要在陵墓规制上直追盛唐之风,让家族永享尊崇,被后世铭记。文章写道,由于李明德希望帝陵突出党项特色,因此西夏陵虽借鉴了中原规制,却最终形成了独特风貌。布局上,它严格遵循“背山(贺兰山)面水(黄河)”,入口低缓,陵体顺着山势逐渐抬升,整体高于入口及阙台,与北宋帝陵“南高北低”的风水取向截然不同。西夏帝陵巧妙地依托贺兰山山势与黄河水脉,坐落于山前开阔的冲积扇上,远远望去,犹如一朵朵以山峦为枝干、面向东方的巨大莲花,盛开在贺兰山东麓。

■文史期刊

王阳明“立功不获赏”背后

《文史知识》2025年9月号,月刊

“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王阳明,被誉为千古完人一个,然而这样的阳明先生却屡屡陷入风暴之中。最新一期的《文史知识》以王阳明“立功”之后的遭遇,剖析了当时的时代弊病。

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七月,时任南赣巡抚的王阳明领兵攻克南昌,彻底平定了宁王朱宸濠发动的叛乱。然而,擒获宁王的王阳明等来的不是朝廷的奖赏,而是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查、骚扰,连跟随王阳明平叛的有功之人,也被当成共犯而遭到逮捕、拷问。直至明武宗正德皇帝驾崩,明世宗嘉靖帝即位,王阳明才正式受封为新建伯,奉诏启程赴京。不料途中接到朝廷旨意,改任南京兵部尚书,不必赴京。王阳明就地上疏请求回乡归省,从此留居乡里,实质上是辞官隐退。

王阳明为何“立功不获赏”,文章从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兵部尚书王琼的矛盾入手进行剖析。两人生于同年,但两人的仕宦道路却颇为不同。杨廷和自中进士后便一直在翰林院任职,后来进入内阁,从始至终都位居清要;而王琼却在地方和中央的各种实务之上历练多年,举凡漕运、盐务、钱粮等无不经手,亦颇有军事才能,可以说是当时实干派官员的代表之一。正德十一年王阳明被任命为南赣巡抚,正是当时在兵部尚书任上的王琼大力举荐。当时宁王反迹渐露,王琼安排王阳明巡抚南赣,便是对此



做防备,可谓颇有远见。相比之下,以杨廷和为首的诸多高官却在气焰正盛的宁王与朝廷之间首鼠两端,甚至暗中为宁王提供便利。为此,宁王之乱平息,王阳明在报功时奉王琼为首,而没提及杨廷和。

文章认为,杨廷和与王琼的矛盾,本质是明代内阁之弊。明代形成了“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不成文规定,内阁大臣的职位几乎为翰林院出身的官员所垄断,形成了一个极为封闭的核心权力小圈子。像王阳明、王琼这样极有才干的官员,因为中进士后没有被选入翰林院,因而也都被排除在权力中枢之外。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阳明立功不获赏的原因昭然若揭。文章认为,明代正德、嘉靖之际,王阳明、王琼等人杨廷和的对立,也可以说是由内阁的专权和排外所引发的一次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而这种矛盾直到明末都未能消弭,甚至愈演愈烈,随着张居正出任首辅而终于全面爆发,成为晚明党争的起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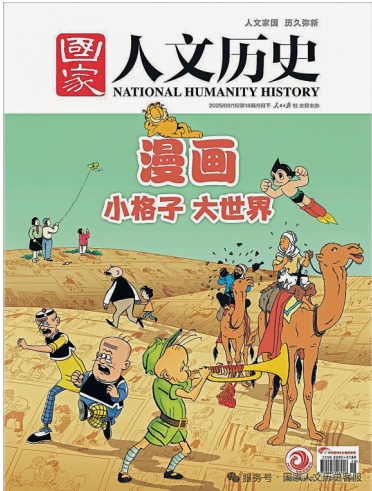
漫画的演进史

《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月下,半月刊

1924年,丰子恺在《我们的七月》杂志发表了自己的成名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作品以水墨绘就,画中疏帘卷起,新月升空,寥寥数笔却余味不尽。时任《文学周刊》主编的郑振铎见此画后大为激赏,邀请丰子恺为《文学周刊》供稿,并于次年将其画作整理成册发行,书名《子恺漫画》。从此,“漫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名字;丰子恺先生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漫画艺术的开创者。最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以漫画的形态演进为脉络,梳理其从单幅讽刺、四格幽默到短篇叙事与长篇巨制的多样风貌。

关于“漫画”的定义很多,杂志将“漫画”理解为一种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视觉诗,“好比文学中的绝句,字数少而精,含义深而长。”最早的漫画是单幅作品,后来因其讽刺性而独具艺术魅力。此时的单幅讽刺漫画如锋铤匕首,直刺社会痛点,鼓舞战火中的铮铮铁骨。文章以丰子恺在抗日硝烟中以笔为刀的“漫画战争”为例,详述其“艺术抗争”的经过与内涵。概言之,抗战的烽火为丰子恺的绘画理念注入了新的内核。抗战之前,他的漫画以“儿童情趣、人间世相、古诗新画”为主要题材,画面宁静致远,包蓄人间情味;抗战之后,创作了大量“为护生而抗战”的作品。在丰子恺看来,漫画的宣传效果比文章大。他主张通过漫画这种感性的画面,让更多不识字的百姓懂得抗日救国的道理,进而加入抗战行列。

四格幽默漫画,则在起承转合之间尽显人生百态,以微缩剧场道尽悲欢离合。四个边框,几道分割线,构成了现代



人非常熟悉的叙事单元。“格子”里盛满了人世间的笑与泪。杂志以“史努比”这一漫画形象为例作阐述:“史努比”是诞生于二战后的经典漫画形象。这一时期,经济腾飞、新技术的普及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大众传媒的脚步则孕育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和审美风格,漫画也不例外。漫画家舒尔茨创作的《花生漫画》篇幅短、易连载的作品,抓住了读者日益稀缺的注意力,作品中的主角“史努比”是一只白色比格犬,它直立行走、聪慧机智、可爱至极且充满好奇心,折射出这一时期典型的美式生活方式,深受读者喜爱。

杂志还以地域为脉络,梳理了漫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在日本与美国,漫画发展出独特的商业模式与文化生态,其内容与审美无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留下不同风格的烙印。而中国现代漫画自《子恺漫画》发端,历经救亡图存的烽火岁月、改革开放的文化复苏,至今日网络条漫与动画电影的蓬勃共生,每一步皆与国运民情紧密相连。

■读书期刊

正视抗战历史

《中国图书评论》2025年9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中国图书评论》杂志刊发两篇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书评文章,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学者杨惠迪结合中国导演方励执导的纪录片电影《里斯本丸沉没》,评述了英国历史学者托尼·班纳姆的著作《里斯本丸沉没》一书。电影与图书的历史背景一致:1941年,香港保卫战失败之后,1.4万名英国驻港官兵沦为战俘。翌年,日军将其中的1816人送上了货船“里斯本丸”,意欲将他们运送回日本充当苦力。这艘货船因日军未悬挂运送战俘的旗帜且装有大炮,被美军误杀,英军战俘竭力逃生却惨遭日军的无情射杀。危急关头,舟山渔民划着舢板救起了384名盟军战俘,还为他们提供了衣服、食物与栖身之地。

面对这段历史,方励关注战俘后代们对父辈刻骨的追思,展现出那些凋零的年轻生命背后,一个个家庭所承受的巨大悲痛与创伤;历史学者班纳姆则试图重构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因为在英国的主流历史叙事中,这些战俘的苦难无人问津。他的创作起点,是竭力追踪每一位战俘的生命轨迹。其著作通过史料考证与个体记忆,重现了“二战”时期驻港英军战俘的苦难经历与生命轨迹。叙事以“受难者”为中心,展



示了普通士兵在极端境遇中的坚韧与挣扎。二者的叙事重心之别,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忆建构逻辑,但共同揭示了“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普遍性意义,在于它展现了人性在极端境遇下的复杂面相——有日军行径的残暴不仁,有英军战俘的非凡坚韧,更有舟山渔民的人道主义光辉。

学者蒯静评论的《当帝国回到家:战后日本的遣返与重整》一书,历史时间点为战后的日本,从1945年秋到1946年底,以美国为主的盟军以“去军事化”与战后秩序重建为目标,主导了日本帝国解体所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不仅在短时间内将日本人从殖民地迅速撤回,也将“前殖民地人民”送离日本。这场被称为“返迁”的行动,却被日本各方刻意重塑为“战争受害者”形象,通过这一“悲情逻辑”抹杀战争罪恶的种种。文章深刻揭示了所谓“战争受害者”原本的历史形象,对“悲情逻辑”也进行了批评与反思。

微观历史面面观

《书城》2025年9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书城》杂志的“书城读书会”栏目,刊发历史学家王笛的文章《建构微观历史中的边缘者叙事》,标题中的“微观历史”对应“小叙事”,“边缘者叙事”对应“民众写史”。

文章首先回答了何为“微观历史”。实为“历史小切面的放大研究”。对细节的执着,正是微观史与传统史学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作者认为,“微观历史”就是“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它需要具备两个要点:其一,要有细节,要有故事;其二,研究对象必须是那些“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边缘人物而不予理睬,甚至通常全然无视”的普通人,是“那些被迫害的和被征服的人”。

为什么要讲“边缘者叙事”?文章写道,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史家关注的更多是国家、战争、王朝更替,主角是将相王侯、革命英雄、大人物,以至于我们今天熟悉的“大历史”,往往是由少数掌权者书写的,是胜利者的记忆,是主流社会的自我表达;但是在历史的背后,还有无数“没有名字”的人:农民、磨坊主、街头艺人、茶馆老板……他们的



声音、思想、日常生活“在大历史”中极少出现,微观历史专门把目光投向这些历史舞台边缘的小人物、小事件、小空间。它相信,在这些被边缘化、被遗忘的个体身上,同样蕴含着深刻的时代信息,甚至有可能揭示主流叙事所忽视的张力与裂痕。

作者同时指出,微观历史并不只是关注“边缘人”,它更关心的是: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之外,是否存在另一种观看的可能?因此,微观史不是宏观史的对立面,而是其补充与批判者。它通过将“放大镜”置于微小之处,重建那些被主流历史遗忘或压抑的经验。